



《桂林文化》杂志出刊始末

□李 侃 文/供图

《桂林文化》是上世纪桂林市名噪一时的杂志，在那文荒稿荒的年代，它为我市培养了一批作家、写手，是桂林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一段记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在走过十年特殊时期之后，我们百废待兴的祖国开始有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文艺园地正在复苏，不少好的作品陆续出现。正逢其时，我从市一建公司调到市群众艺术馆当编辑。在馆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接连召开了两次业余作者会，就桂林市的文艺创作如何开展征求大家的意见。同志们一致认为，要繁荣创作就必须有发表作品的园地。经过认真研讨和请示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试刊《桂林文化》杂志。

这时馆创编室只有一个同志，还被抽去搞专案了，后来上了大学，这个部门可以说是名存实亡。我翻看了稿件登记簿，了解到1979年上半年创编室收到作者来稿只有20来篇，前两年编的一本内部资料《桂林演唱》也成了一年编一本的年刊。我是工人业余作者，虽然写过一些作品，但这与抓全市的业余文艺创作却是两回事。成了编辑，角色蜕变，业务生疏，面临着窘迫的局面，我感到困难重重，不知从何入手。

搭起了台子，就要敲响锣鼓，一个人也要唱戏。要办刊物，得先发动群众，把信息发出去，将我们的刊物急需哪些稿件，广而告之。我油印了50多张创刊征稿启事，四处张贴，八方寄送。可能作者们当时也很需要发表的园地，没过多久，我们便陆陆续续收到了不少稿件。我罗列了不少栏目，有曲艺场，朗诵诗，歌曲，漓江歌台，桂林山水传说，桂故从谈，谈山说水，游记，文艺创作基本知识，山水诗，故事，散文，通俗小说等，下一步就是选稿，根据栏目要求找稿子。李育文先生是一个尽职的馆长（主编），我通过的稿件送给他，他总是及时审读，写出具体的意见，这给编辑节省了不少时间。我又找到不少刊物，反复研究它们的特点，决定自己刊物的风格、样式。接下来就是请人设计封面，著名金石书画家李骆公先生欣然为我们题写了刊名，本馆画家邓福觉先生设计了有工艺美术风格的封面。第一期刊物在漓江印刷厂印制，为32开本，80页，印了3000册，每册定价1角钱。我用板车是从老人山下的漓江印刷厂拉回仁路馆里来，虽然流了一身的汗水，但那高兴的劲儿就别提了！刊物质量怎么样，群众通不通得过？心里没有底。我们一方面分送一些样刊给业余作者和专家、领导，登门倾听意见；另一方面，我还和放假回来的毕浩同志扛着书到阳桥头去叫卖，为的是更好收集读者的意见。我们悄悄地跟在买了书的读者后面，偷听他们的议论，听说他们说喜欢哪些栏目，不喜欢哪些文章，以便今后改进工作。

接着编了第二期稿子。可是问题来了，市里的印刷厂由于印件多忙不过来，安排不下我们这个小单业务。这可怎么办哪？刊物不能按期出版，就失信于作者和读者。我无可奈何，把眼睛

往县里看，坐上火车到永福印刷厂联系，不行；又急忙赶到鹿寨印刷厂，好说歹说他们接了货，这才放了心。校对时，我和这时从大学毕业回馆的毕浩又分别两次到鹿寨，上午坐车去，高速度校一遍，下午乘火车赶回来。中午根本不能休息，午饭也是买两个包子在印刷厂应付。

编了两期刊物，得了一些经验，工作起来顺手多了。1980年我们将刊物从32开本改为16开本，正式编成季刊，印刷量由每期3000册上升到了每期1万册。香港著名作家何达，美籍华裔著名作家聂华苓等也来了稿件。这一年，我们收稿量达到了800多件，我市搁笔多年的一些作者又拿起了笔杆。给我们写稿的新老作者有四五十人之多。凭着一股子韧劲，局面就这样打开了。

由于刊物按期出版，又有一定的质量，从1981年起，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桂林文化》在国内正式公开发行了。据我了解，我区地、市一级群众艺术馆中，当时就我们这个刊物得到了批准公开发行。下一年我们又将刊物改成了双月刊，最高印量达到4.5万册/期，刊物从印刷厂运回来时装了满满一卡车，再不是用一辆板车可以拉得完的了。结算情况遂人意，不但回了成本，还小赚了一笔。

不久，纸张提了价，我们的办刊经费自然感到紧张。为了开源节流，我打听到柳江造纸厂有“次品”纸出售，于是就和编辑部的同志（1981年请了两名业余作者张宗拭、汤世民当编辑，共4人）到柳江造纸厂筹集纸张。联系和押运一车纸回来，往往是清晨上路，要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才能回家。这样每吨纸可节约几百元，解决了不少问题。当时经常给我们投稿的作者数上升到100多人，一年的收稿量达到了2500件之多，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市业余文艺创作初步繁荣的局面正在形成，当然这与《漓江》文艺杂志（市文联主办）、《桂林日报》副刊部各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为了提高刊物质量，我们还用办班的形式培养作者，一方面请大学老师和作家讲课，另一方面组织作者互相看稿改稿，解决写稿中的疑难，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办班是以《桂林日报》副刊部和《桂林文化》两个单位的名义合作的，日报编辑苏理立老师自始至终参加了工作。我们主持了两期培训班，1981年3月和1982年5月各一次，每次10天。两期培训班，每期有四五十人参加，大多是来自基层一线的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单位的写作尖子，有的成了名作家，有的还因文笔出众成了领导，比如：王勇、毛荣生、汤世民、刘志敏、刘血花、麻秋鹤等。直到现在，我们见面回忆起当年“文创班”的学习写作情景，还津津乐道，感到学到了知识，丰富了人生阅历。

当编辑是无名英雄，要有乐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一篇稿子辛辛苦苦编好了，印成了铅字，标题下是人家的名字，稿费送到人家手里，作者名利双收，编辑往往还因注意不到的疏漏造成错

误，挨批评。但是，既然干了这一行，往高尚上说，是干事业，往低处讲，是兴趣爱好。总之必须安心地干，快乐地干，想方设法干好来。

于是，我和其他几位编辑商量好，由我起草了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文章《为无名小辈登上文坛砌石铺路》。宣称要

给那些年轻的、不出名的、被大家遗忘了的文学作者做梯，让他们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坛！我们有宣言，也有行动，两次刊发了我市青年作者处女作，总计有13篇之多。有人说当编辑掌握了稿件的生杀大权，而对待自己的稿件，又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先发表。我警觉到了这种现象，首先在编辑部提出每年每人在本刊发稿不得超过两篇。从原则上卡死了“后门”之风。而我自己1982年全年基本上没有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一篇稿件。相反，为了业余作者的稿件问世，我和其他编辑经常三番五次地找作者商量，反复修改，像青年处女作《看山狗外传》、《露》、《粽粑伯娘》等稿件就是这样。有一篇小说《月光曲》，发稿到印刷厂后，我们觉得该小说中有不妥之处，为了对作者和读者负责，我火速赶往印刷厂，花了半天时间对稿件作了修改。后来这位作者在给我们的来信中说：“你们为了培养文学新人，真是呕心沥血！”

我自己是工人业余作者出身，对业余作者写稿时熬更打夜的艰苦深有体会，所以，我和其他同志商量后，提出要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的诺言，不用的稿件基本都能退回给作者，并尽力写出意见。但是业余作者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时也出现麻烦的事情。比如，我市电厂有位作者写了篇小说，我们看后作为备用稿提了意见请他修改。他在我们退稿期间将稿件又投给了另一杂志社，可能是想试一试我们的“眼力”。但另一杂志社也未采用他的稿件，他又将稿件原封不动拿来给我们，说他改不了，要我们帮改。当我们把稿件打开看时，在我们原批签的意见旁他还写上了“怪论！”“此亦怪论！”等批语，这是考验我们呢还是他忘记了擦去，不得而知。这使大家很惊愕。我们提意见的地方就是要改动的地方，你都批上了“怪论”，你不改，我们怎么好动手改呢？在馆领导的支持下，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封信，诚恳地向他谈了我们的具体看法。谁知他接信后立即来信反驳和讽刺，弄得我们个别同志都气急起来了。按理说，像这种情况，编辑部是可以不必理睬的，把稿件退回他算完事。我冷静地想了想，一个业余作者写一篇稿件不容易，再说，他今后还得写稿，我们不在乎一稿的得失，关键是要帮助他端正写稿的态度。于是，我又心平气和地给他写了第二封信，和他



▲不同时期的《桂林文化》

讲道理，进一步指出他不对的地方。后来一次我出差南宁，与他在火车上不期而遇，我俩促膝交谈，终于听到了他表示歉意的话。

正当我们兴致勃勃要大干时，馆长传达了市文化局主要领导的指示，责成刊物改名为《桂林艺术》。既然是艺术类刊物，就不能发或者少发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刊物的发行数又一落千丈啦，回到每期3000册。这种状况维持到1984年秋季，广西的通俗文学热火了起来，我们趁势申请改刊为《故事天地》。当时市文化局主要领导也换了人，不然也改不成。

《桂林文化》1979年下半年作为试刊，出版了两期，32开本，每期定价0.10元，印3000册。1980年改为16开本，季刊，全年出

版4期，每期定价0.25元。1981年，16开本，双月刊，全年出版6期，每期定价0.25元。1981年10月起国内公开发行。1982年冬更名为《桂林艺术》，每期定价0.30元，至1984年秋止。1984年年末改名为《故事天地》，一共出版了13期，至1987年终刊。人员方面，从开头任编辑的我、毕浩（后提升为馆长），到后来陆续调入了李顺九、甘金山、林枝（美编）、申咏秋。

1984年年末出版《故事天地》，印量大幅增加，最高期印数达150万册，发向全国各大城市，广州、上海、西安、武汉等地每期均发有6万册，编辑、发行工作特别繁重，这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技术人员在草坪绿地进行红火蚁防治工作。

近来，桂林某大学、临桂区境内某卸油站、临桂区某别墅区等地绿地，接连发生学生和员工被红火蚁蛰伤的事，一时让受害者谈蚁色变。广西科迅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简称“科迅公司”）接到求援，上门积极剿杀红火蚁，已将20多个单位公共绿化地上泛滥的红火蚁摆平。

某大学发现数百窝红火蚁

日前，桂林某大学接连发生学生在绿化地活动时被一种小红蚂蚁蛰伤的事。被蛰伤学生反映：脚手皮肤被这种小红蚂蚁蛰伤后，立即产生剧



红火蚁接连蛰伤人

——广西科迅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积极剿杀红火蚁侧记

烈疼痛，有的还引起全身低烧，过一天后，被蛰伤处便产生水泡，随后变成一个个白色的小脓胞，胀痛奇痒，让人非常难受，伤口往往15—20天后方才结痂，并且留下很难消退的暗黑色疤痕。

学校相关领导得到情况反映，便请来科迅公司的石树长董事长到现场查看，发现这种不时蛰伤学生的红火蚂蚁身体不大，体色呈棕红色，头大屁股也大，腰身却很细，窝上有细泥堆，认定这种小红蚂蚁是毒蚂蚁——红火蚁。经清点，该大学公共绿化地带共有大小红火蚁数百窝。

据石树长介绍，红火蚁是一种外来入侵有害生物，是农业及医学害虫，源自南美洲。它在上世纪30年代传入美国，于本世纪初通过货柜及草皮从美国蔓延至我国广东等地区，继而通过草皮花木或者飞行向周边迁移，目前已蔓延至桂林地区。

红火蚁臭名昭著，它接触到人的皮肤时会主动攻击，它发动攻击不是靠嘴咬伤人，主要是将带毒的尾针刺入人的皮肤注射毒液，让人产生一股灼烧般的剧烈疼痛，被蛰伤处会逐渐产生水泡，几天内则变为白色脓胞，如果抓破受感染，治愈后会留下疤痕；被蛰伤严重者，会引起休克甚至死亡。小小红火蚁在国外每年都有致死人的

报道。除此之外，红火蚁还破坏环境，毁坏庄稼，因此，红火蚁被列为世界上100种危害最为严重的生物之一。红火蚁特别喜欢在草坪、绿化带、庄稼地中筑巢，人不小心踩到它的窝时，它们就会倾巢而出进行攻击，常叫被蛰伤过的人谈蚁色变。

热心服务市民剿杀红火蚁

某大学相关领导了解到红火蚁的严重危害后，为保护学校师生安全，决定请科迅公司帮助学校治理这种可恶的毒蚂蚁。

科迅公司消杀人员从车子后备厢取出小型喷雾器及专业灭红火蚁的药粉，来到学校绿化带，用工具轻轻撬开一窝窝红火蚁窝，等到众多红火蚁爬出来四下乱蹿时，便用小型喷雾器将剿杀红火蚁的特效药粉喷到红火蚁身上及其巢穴内部。仅仅过了几分钟，大量张牙舞爪的红火蚁纷纷倒地挣扎，不久便一命呜呼。

连日来，科迅公司专业消杀人员连续7轮的剿杀，目前该大学绿化地带的数百窝红火蚁已基本被剿灭。

前不久，临桂区境内某卸油站绿化地带发现100多窝红火蚁，已有多名员工被红火蚁蛰伤，单位便自行购买药物进行治理，但效果不好，且发现原来灭治过的地方又出现几堆小的红火蚁堆。该单位马上重视起来，请求科迅公司帮忙防治红火蚁。科迅公司专业消杀人员上门经3轮治理，方才将这些可恶的红火蚁斩尽杀绝。

此前，临桂区某别墅小区的多名绿化员工在劳动中被红火蚁蛰伤。经科迅公司专业消杀人员

受害者谈蚁色变

到小区清点，仅在该别墅区人工湖的周边就发现200多窝红火蚁。经多轮防治，该别墅区的红火蚁已基本被消灭。

仅最近一个多月来，科迅公司热心服务市民，已积极上门帮助20多个单位剿杀红火蚁，摆平了一个又一个作恶多端的红火蚁王国，受到大家的好评。

石树长说，近年来，桂林市区每年都有学生和市民因被红火蚁蛰伤而到诊所、医院打针治疗；由于被红火蚁蛰伤后，疼痛奇痒，康复时间长，加上被蛰伤处一般会留下永久性疤痕，因此，人们对红火蚁深恶痛绝。

科迅公司剿杀红火蚁有绝招

红火蚁繁殖速度快，生存能力强，人们用传统的火烧、水灌、捣窝的办法基本没有什么效果，但科迅公司剿杀红火蚁却有绝招。

据石树长介绍，该公司灭杀红火蚁有4种办法：触杀、胃毒、内外扰、扰乱其生殖系统。该公司使用的各种药物，是专门为治理红火蚁研制的特效药，只要将相关药物或药剂喷洒到红火蚁身上或窝上，凡接触到或食用了药物的红火蚁不久便会慢慢死掉，乃至感染其他红火蚁，最后引发全军覆没。

石树长说，红火蚁虽小，但迁移繁殖快，一个地方的红火蚁被剿杀了，但过不了多久很快又会有红火蚁从附近迁移而来，只有大面积同时防治红火蚁效果才是最理想的。如果让其泛滥，便会严重危害到市民身体健康和环境，因此，发现红火蚁要及时剿灭，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红火蚁在桂林的发现，应引起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治，要将红火蚁灭杀在初期！”石树长说。

“红火蚁虽然可恶，但可防可治，市民不要恐慌！”石树长说，“人们平时在草地、绿化带、庄稼地上劳动或休闲时，一定要检查是否有红火蚁窝（有突出地面的细泥堆），如果发现有，最好不要踩到它的窝。市民、特别是小孩，应避免在红火蚁活动区域停留或故意去捅蚂蚁窝，以免被红火蚁蛰伤！”

科迅公司是一家具有国家A级资质的专业有害生物防治公司，业务遍及广西各地。如果有需要防治红火蚁的单位和个人，请及时联系科迅公司，本公司的周到服务一定会让你满意！

咨询电话：0773-2858855 13097930986

▼工作人员被红火蚁咬伤后长出了一个个“小脓胞”。

